

镜子里的联结

——A. S. 拜厄特《吹口哨的女人》中的电视与知识

姚成贺

DOI: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5.03.015

内容提要:《吹口哨的女人》是 A. S. 拜厄特四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小说中的电视访谈节目“镜中游”是一处典型的知识话语交织的场景。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电视节目的内容与镜头前后人物的思维过程体现了不同领域、类型、主体知识的交汇与碰撞。本文将“联结”作为电视节目所展现的知识话语的关键词,认为小说中的“联结”包含了多个层面的意义。文学知识与科学知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镜头前后的自我与他者通过对电视的凝视以及对镜头的凝视被聚合在一起。

关键词:拜厄特 《吹口哨的女人》 联结 知识话语 电视文化

作者简介:姚成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Title: Connection in the Mirror: Television and Knowledge in *A Whistling Woman*

ABSTRACT: In A. S. Byatt's *A Whistling Woman*, the television talk show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is a cultural site that connects various discourses of knowledge. A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television program tracks its characters before and behind the camera to represent the clashing as well as merging of thoughts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of various types, by different subjec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plex connection that discourses of knowledge display in the program, analyzing how the novel thereby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elit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and self and other through the act of gazing in and outside of the TV set.

Keywords: A. S. Byatt, *A Whistling Woman*, connection, discourse of knowledge, television culture

Author: Yao Chenghe <yaochenghe@163.com> is a lecturer at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China (100070).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吹口哨的女人》(*A Whistling Woman*)是当代英国小说家 A. S. 拜厄特(A.S.Byatt, 1936—)四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作为拜厄特的又一部“观念小说”,作品字里行间包裹着层层叠叠的宗教与文化外衣,知识的陈述俯拾皆是。对于小说的智性特征,评论界的态度并未达成一致。例如,戴维斯(Steve Davis)肯定了拜厄特将对“任何事物的智性好奇与清晰明了的叙事、扣人心弦的情节相结合”(24)。他同时批评《吹口哨的女人》过于强调智性因而艰涩难懂,以至于读者永远不会理解所有的典故。与之相反,诺里斯(Pamela Norris)指出《吹口哨的女人》中大量文学与科学的引文赋予人物“无止境的力量”,从而避免了他们各自的悲剧命运(51)。对此,马西(Allan Massie)抱有同感,他在评论这部小说时认为作品是一次“智性探险,充满了生机与活力”(6)。学者们对作品的智性特征给予了关注,但其中不同的知识是以怎样的形式共存、知识的追求者又是如何相互交流与理解却没有得到深入探究。与四部曲前三部作品不同,在《吹口哨的女人》所展现的时代,电视逐渐成为包罗万象的文化形态,一个融会新闻、历史、知识、娱乐,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于一体的“信息库、知识库、文化库”(徐瑞青3)。拜厄特于是在小说中设计了一档电视访谈节目“镜中游”,作为一处典型的知识话语交织的场景,使镜子成为小说中的重要意象之一。这不仅仅是一档评论性的访谈秀,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49)。节目围绕一件器物、一种思想和一个人物展开,体现知识的共享与探索知识的过程。

“联结”一语出自福斯特(E. M. Forster)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 1910),主人公玛格丽特费尽周折,努力在不同阶层之间建立联结。卡特(Ronald Carter)在评论福斯特的“联结”时评价道:“如果各种不同的文化与人生态度、甚至相互排斥的价值观念可以沟通,那么个人与社会就可能形成完美而健康的融合,人间之爱就可大放光彩”(转引自董洪川)。福斯特希望英国的各个阶级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同时,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惟有联结”也暗示了阿诺德(Matthew Arnold)对福斯特在创作思想上的影响。麦格克(E. Barry McGurk)指出,《霍华德庄园》中的施莱格尔一家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诠释了追求知识与自我完善的希腊精神的真谛;威尔克斯父子则是实用主义的代表,展现了强调行动的希伯来精神。小说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调和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而玛格丽特则成为这种平衡与联结的执行者。

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将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描述为“影响世界运转的两大源头”(96)。他从未将希腊精神对智性的强调与希伯来精神对行动的重视割裂开来,而是坚持二者的平衡,认为它们拥有相同的终极目标,即人类的完美或曰救赎。拜厄特是一位以“智性书写”而著称的小说家,她的“联结”承载了作家对于思索的热情。她笔下的人物多是如施莱格尔一家那般追求知识,渴望“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因此,“联结”更多地体现在追求知识与自我完善的方方面面之间的联结,其中也不乏智性思索与行动的联结。在《吹口哨的女人》的致谢辞中,拜厄特记录了与不同领域的学者交流学习的经历:蜗牛与遗传学、生理学与认知、电视的可能性、关于金雀花的电影、阅读障碍、关于鸟类的人种学著

作、个人魅力、群体与群体治疗、宗教文化等。这表明四部曲中有关科学研究的知识话语并非作者一时兴起、拼贴偶成,而是经过细致严谨的阅读与考察后,以艺术的手法融入自己的创作。拜厄特在文学艺术之外的天地里找寻兴趣点与创造力,并且发现了超越文学知识禁囿的令人兴奋的新途径。因此,这里的“联结”包含了更多层面的意义,包括在知识的不同领域、精英文化与大众群体、自我完善与他者沟通之间的联结。文学知识与科学知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镜头前后的自我与他者通过对电视的凝视以及对镜头的凝视被聚合在一起。“联结”不仅仅是小说中的电视节目“镜中游”的关键词,也是整部小说的主旋律。

一、科学与文学知识的联结

文学史上,科学与科学思想以不同的方式被写进散文、诗歌、戏剧之中。而今天,当“文学”与“科学”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二者之间却常常充满了紧张与竞争。探索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共同点往往是争议与分歧的焦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所描述的“两种文化”。1959年5月,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演讲,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两极的,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他认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革命力量是科学,但科学家不为人所重视和了解,并对文学艺术兴趣淡薄。另一方面,文学家对科学的发展进步茫然无知,思想落后于现实,甚至趋于保守反动。因此,他主张在这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桥梁,以利社会的发展(3—4)。实际上,文学与科学是一脉相连的,正如莱温(George Levine)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是嵌入文化之中的”,“科学与文学是在它们所参与的文化大环境中相互形成的,包括知识、道德、美学、社会、经济、政治群体”(5—6)。

拜厄特在利维斯影响下的剑桥大学接受教育,深受两种文化之争的影响。她在《吹口哨的女人》中书写了文学、科学知识话语,并试图以小说创作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在她设计的文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相遇、交流的场景——“镜中游”中,文学始终是其讨论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第二期节目围绕自由女性、乔治·爱略特、特百惠碗展开讨论。三位嘉宾讨论了爱略特笔下的女性之美,认为作家有意惩罚她笔下那些漂亮的女性人物,那些利用美貌谋利、靠外貌吃饭的女人(144)。“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小女孩们拥有智慧、魅力、人性,但长大成人之后却成了怪物、魔鬼、受害者。……或许我们不应该长大”(146)。而以《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 in Wonderland*, 1865)的作者卡洛尔(Lewis Carroll)、荒诞无聊作品(Nonsense)以及古镜为主题的第一期节目,开始了以科学发现解读文本的尝试。嘉宾格里高利的讨论涉及从儿童的视角看爱丽丝作品中维多利亚式行为,对小门的心理分析式解读,以及爱丽丝梦境的超现实主义激情等内容(135)。他从卡洛尔对“成双成对”的兴趣出发,分析认为:“实际上存在两个爱丽丝,仙境中的爱丽丝·利德尔与她的表妹爱丽丝·雷克斯”(136)。镜子的逻辑轨迹与光点是左右颠倒的,而不是上下颠倒,镜子自有其非逻辑的逻辑性。擅长研究大脑建构视觉世界过程的格里高利在此再现了“镜子游戏”视角下的文本解读,提出从另一面看问题的“穿越”概念,可说是以科学发现解读文学文本的一段颇具新意的文学评论。

如果说小说中的文学知识话语因作者的学术背景而不难理解,那么广博的科学知识话语则很容易激起读者的好奇,因为它们并不是拜厄特所擅长驾驭的知识领域。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在英国的电视节目中,谈话讨论类节目拥有更为宽泛的范围。主要频道的黄金时段都安排了更多的谈话讨论节目。(与美国相比)英国电视节目的范围不仅更

为宽泛,而且更为独立”(*Television* 46)。“镜中游”中的知识话语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具开放性,嘉宾也不拘一格。第三期节目的主题是“创造力”,更加直接地探讨了文学与科学的碰撞。嘉宾之一、认知心理学家品斯基在节目中对于什么是创造力这一问题给出了科学的定义,同时并不否认科学之艺术性的存在,指出认知心理学与精神分析不同,“它本身就是运用诗性印象与共鸣的诗歌”,甚至计算机也会学习,会辩读印刷的字母和摩斯密码,“也许有一天会理解《哈姆雷特》或贝多芬第三交响曲”(153)。这样的观点难免遭到攻击,小说中的精神分析学家甘德认为,科学家总是将科学发现作为创造力的范式,但是“你永远做不出一个可以解释《李尔王》的试验程序;你永远不会在实验室模拟出贝多芬卓越的感伤力,或意大利画派名家皮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名作《基督的洗礼》中数学精准与宇宙领悟之间的平衡”(152)。在他看来,伟大的艺术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人类力量真正的极限,它们接受阐释而又抗拒归类,这是科学无论怎样努力也难以企及的。

对于文学艺术领域的作家们来说,科学思想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也是一座矿藏丰富的寻宝之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作家是否会在作品中书写科学知识,而是作家与科学家是否能够分享相同的世界观。乔治·爱略特曾经运用 19 世纪医学的最新科技成果作为观察人物的方式,以细致入微的科学观察方法书写人物、表现人物性格。时至今日,许多受到科学研究方法启发而创新的叙事方式已经不再新鲜。后现代理论家批评现代科学,试图为科学“去神秘化”。在他们看来,科学同样是文化建构,不再拥有接近知识与真理的优先地位。霍甘(John Horgan)强调“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家提出最具后现代性的假设”,并称其为“反讽的科学”。库恩(Thomas Kuhn)也指出,科学试图揭示的是流行的科学范式,它并非一成不变。许多大科学家不再抱有他们完全客观地生产可信赖真理的观点,相反,他们更愿意思考“现实”的现实性。

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联结

科学的发展也促使精英文化走向大众。小说所描写的时代是“一个语言成为图像附庸的时代,电视机的使用和普及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48),一些原本属于精英范畴的知识已经通过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变得触手可及、人人可享。“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人们已经生活在通讯技术的新时代里,大部分以电视的新形式为中心”(Williams, *Television* 139)。电视机前的观众从未被要求接受过高等教育,知识话语存在的空间已经通过科技的进步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尽管如此,固守利维斯主义的人物在小说中仍然存在。例如弗莱德丽卡的父亲比尔·波特痛恨电视机的普及,他斥责道:“对个体真正的危险来自这个小屏幕,它消解了读书、交谈、游戏、技艺与生活”(*VG* 325);接受精神理疗的摩尼教徒兰姆也认为收看电视节目“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非常可怕的事,它会改变我们意识的性质,包括智者、无知者、愚蠢者”(197)。这颇似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否定态度,认为这种文化植根于当代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流行文化,是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掌控传播媒介制造虚假需求,沉浸在娱乐和消费中的人们日渐丧失其主体和个性。但伯明翰学派做出了相反的认识预设,他们“认定大众文化具有天然的反主流意识形态倾向,而资本主义宰制意识形态则是由受主流媒介推崇的精英文化来维持和传承的”(转引自张琦 141)。尽管接受传统英式教育的弗莱德丽卡仍持有传统观点,认为“我们需要的是语言建构的图像”(48),却已身不由己地钻进了这个“小盒子”并在其中大展拳脚。

阿诺德是精英主义文化观点的第一人,他一方面肯定了艺术作品对于人生理想、人格塑造、理解世界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开始了艺术作品与大众文化的割裂。20 世纪 30 年代,“利

维斯主义”(Leavisism)开始了对英国文化界绵延达40年之久的影响。这种思想与阿诺德的文化观一脉相承,均认为文化是文明的极致表现,是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的关怀对象。对持利维斯主义的人而言,首要历史使命是捍卫文化精华,亦即“一面建立判别好作品的文学典律,一面批评使人‘耽溺’于‘丧志’的广告、电影和通俗小说”(巴克45)。与之相反,威廉姆斯反对精英主义概念,强调文化日常,他认为文化的本质在于“文化永远是既传统又创新的,同时是最平常且人所共知的意义”,“文化”一词包含两种意义:“既意味着生活的全部方式,即共享的意义;也意味着艺术与学习,即探索与创意活动的特殊过程”(Culture xvi)。^①拜厄特一方面继承了利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观,另一方面则对其提出质疑,寻求知识共享的方式,并肯定了文化从精英走向大众的趋势。《吹口哨的女人》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非严格意义上局限于文学领域的利维斯主义,而是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知识领域。拜厄特试图在小说文本中创造话语交流的空间,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壁垒。正如反抗学校制度的学生运动中高喊的口号:“来分享你的知识,无论多么高深,无论多么浅薄”(85)。

文化从精英走向大众的趋势从“镜中游”节目内容自试播到第二年第一季度的变化中可见一斑。三次试播讨论的内容包括:杀虫剂与占星术、记忆与进化、逝去的过去与精神分裂、驯化与自然、语法教学、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盾夫人(Mrs. Beeton)以及劳伦斯。这些访谈节目中,嘉宾侃侃而谈的更偏重于曾经被定义为“精英文化”的内容,尽管也不乏贴近大众的尝试。相形之下,第二年第一季度的节目内容及嘉宾则更加多样化、大众化。第一期的主题是审查制度,围绕作家劳伦斯和现场的一团黑色卷发展开讨论。嘉宾是剧作家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两部戏剧的制作人本杰明·洛奇和寓言作品《乱语塔》的作者裘德·梅森。洛奇与裘德机智地谈论当时播放着的流行音乐《头发》,侃侃而谈嬉皮士与学生蓄长发的流行趋势,甚至还谈及虐恋文学的鼻祖之一、奥地利小说家扎赫尔·马佐赫与毛发、恋物癖、两性畸形等公众禁忌话题。第二期是关于婴幼儿、布莱克、带着小铃铛的出牙嚼环的节目。嘉宾是自然生育专家和儿童心理学家,讨论导致花童(Flower Children)^②的感受力转变并评估理性时代受到压抑的幼儿冲动。第三期节目讨论球类游戏,道具是中世纪球杯游戏的用具。嘉宾包括对力学与轨道感兴趣的物理学家和身为牛津大学教师与蹩脚槌球运动员的音律诗人。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弗莱德丽卡看到人类的成就不仅仅在于文化艺术,也不局限于科学技术,而是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独特的足智多谋与创造能力(267)。

以“镜中游”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的知识传播方式突破了传统,打破了专业知识必定在大学讲坛上传授、专家学者只能在教室里和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专业见解的传统观点。曾经高深莫测的专业知识以一种新的方式与普通大众的生活紧密联结起来。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对资讯社会中知识的状况进行考究时认为,知识的供应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渐渐趋向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求模态,而且日益强化。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最高目的;知识失却了它的“传统的价值”(36)。加海姆(Nicholas Garnham)在分析媒体与知识分子叙事时指出,人们可以在媒体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阶层之间做出清晰的区分,并指出如果知识分子通过书写与演讲促进辩论与反思的传统功能行将就木,那么新功能在媒体知识分子的活动则十分活跃(362)。服务于电视与大众出版界的知识分子比传统知识界拥有更加广泛的观众群体,因此他们获得了塑造形象与信仰的更为强大的力量。拜厄特本人曾经频繁参加访谈活动,四部曲也经由广播的形式以电台媒介进行传播。尽管传统知识分子仍旧对新兴媒体抱有敌意,但不可否认,那个“小盒子”已逐渐走进千家万户并影响引导大众的思维方式。

三、自我与他者的联结

与传统方式相比,当代知识传播的途径因科技的进步变得更为便捷与迅速。威廉姆斯和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关注大众文化生产中隐含的能动力量,他们注重社会对媒体的积极反应,发现民众参与对话时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传媒不再仅仅被看成是消极的和压制性的,同时也被看成是重建现代主体的公共空间。在费斯克(John Fisk)看来,包括大众新闻在内的电视文化传播是一种典型的权力知识话语的传播:“知识就是权力,知识的传播就是权力的社会分配的一部分,建构一种可以嵌入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常识性现实的推理权力是权力社会关系的关键”(159)。这种知识交流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

弗莱德丽卡曾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讨论福斯特与劳伦斯作品中的爱与婚姻,尤其强调“联结”的重要性。她在分析《霍华德庄园》中履行“联结”使命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时说道:差异是永恒的,但是人们不该排斥异己或安于分裂,而是要力图打通内在与外在,精神与物质,从而达到一个圆满之境。弗莱德丽卡意识到文学批评机械式的解读常常会忽视想象的力量,而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平淡与激情的联结”。此处平淡与激情的对立正是阿诺德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相对立的体现,而玛格丽特高呼“惟有联结”。“惟有将平淡与激情联结,二者都将得到升华,人类之爱将攀上高峰”(187)。在玛格丽特看来,真理是活生生的,在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中共存,只有不断深入两个领域行走,才能看清生活的真实面貌。阿诺德指出,“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互相更迭,人的智性冲动和道德冲动交替出现,认识事物真相的努力和通过克己自制得到平安的努力轮番登台——人的精神就是如此前行的”(103)。这也是弗莱德丽卡此后感情生活所实践的原则,她将对生活的思考与对作品的评论相结合,“平淡与激情联结”恰到好处地点明此时的她对于婚姻与爱的观点,将知识女性的智慧与激情相联结。

迫于生活压力的弗莱德丽卡面试“镜中游”节目的主持人并获得成功,她因制作节目而增加对生活与世界的认识,逐渐成长为一个犀利、渊博的“成年爱丽丝”。她曾渴望做一个演员,体验那些她尚未经历过的高贵举止与陌生环境,也曾打算像一个容器那样生活在莎士比亚对生活以及爱的言辞之中。而今,弗莱德丽卡改变了初衷:“不,我不要表演,我要思考”(138),“知识至关重要”(137)。弗莱德丽卡通过节目获得学习、思考的空间,第二期节目关于女性的讨论无疑使弗莱德丽卡得以重新思考自己的需要和权力。那时的她与丈夫离婚后带着儿子独立生活,节目中也谈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想要独立生活的问题。并设想“如果我们独立生活,如果没有婚姻,如果男人是可选项,那么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生物?”(146)这期节目嘉宾佩妮从最新科学研究成果的角度阐释这种可能性,告诉弗莱德丽卡和观众:将冰以一定技术手段应用于卵巢中,在特殊条件下可产生孤雌生殖,于是男性与女性必须结合在一起的生理基础便不复存在。

节目也为弗莱德丽卡提供了一方展示自己的舞台,为自己创造了与屏幕前的观众相联结的机会。电视提供了最大范围的同时获取资讯的渠道,这是人类未曾体验过的(徐瑞青 109)。从未看过这类访谈节目的杰奎琳观看第二期“自由女性”节目后大受触动。三位知识女性谈起女人的真正所想时因她们的知识显得振振有词,极具说服力。其中有关生育的问题更令杰奎琳感同身受,弗莱德丽卡“身体想要怀孕,但女人常常不想”(143)这一席话,对刚刚失去腹中胎儿的杰奎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令当时还是杰奎琳伴侣的卢克对弗莱德丽卡产生一种非理性的痛恨。弗莱德丽卡与杰奎琳就这样通过电视机屏幕发生着交流。卢克不喜欢第三期

节目的“创造力”主题,节目中品斯基讲述的弗洛伊德故事令他想起不快的现实,想到自己失去的孩子。弗莱德丽卡以一种技术性方式大谈女性禁忌话题更是令他难以忍受。尽管存在诸多不满与厌恶,不可否认的是,“镜中游”和弗莱德丽卡此时已经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与卢克的生活产生了某种联系。卢克继而又观看了“镜中游”的一期节目,主题是相似性与复制、伊莉莎白一世及其画像。节目嘉宾将伊莉莎白的画像视为图标,认为这幅肖像的魔力在于,它是崇敬与魔力二者共同的对象。弗莱德丽卡由此及彼,引导嘉宾思考自己的面孔:“我们拥有个人独特的面孔,然而我们同时全部由无止境的家庭基因的复制而建构,因此我们还有一张家庭面孔。每天乘坐地铁时看到的所有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320)。这引起了卢克的注意,因为这种看法触及了他自己关于克隆与二倍体受精卵的复杂思考。如果人类也以无性方式进行复制,地铁里的人就会一模一样,从而面临失去多样性的危险。卢克因此对弗莱德丽卡产生友善之感。从最初认为弗莱德丽卡令人难以忍受,到后来产生亲近的愿望,卢克对弗莱德丽卡的态度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在大众媒体时代,知识必然需要适应社会状况的改变,而知识分子也相应地需要新的知识共享的形式中找寻自己的位置与出路。电视机的应用普及使得媒体成为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传递的重要途径,他们的话语权在媒体场域内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从而大大增加了个体对自我、对自身归属和对自身身份反省的空间。

结语

在科技与媒体高度发达的新时代,人类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镜像化、幻觉化。现实世界被技术与想象力建构成“仿真”世界,一个由符号包裹的影像世界(Williams, *Television* 79)。在拜厄特笔下,电视这一科技进步的产物并未沦落为消解读书、交谈、思索的可怕魔兽,而是充满感性与理性、心灵与激情相联结的智慧魔盒。即便是在电视节目中,她也希望自己笔下的人物拥有自行思考的能力,并以这种形式带给读者深思。人物所追求的目标是理解从日常生活到崇高事业中合乎理性的思考,是不同认知视角相互碰撞、协同合作的过程。若要建立健全的秩序和权威,“只有与实际主宰我们的本能和力量逆向而动,认识其本来面目,洞见它们与其他本能和力量的联系,以扩大我们的整个视域,扩大我们对生活的理性把握”(阿诺德 106)。合乎理性的认知不止包括对知识的追求,还在于运用知识决定怎样行动,从而帮助人们在世界中生存。

注解【Notes】

- ① 威廉姆斯考证了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文化”一词的意义演变,并指出:“在这个时期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成长的倾向’以及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完善的思想具有密切的关系。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的一般状态’。再后是表示‘各类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参见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 ② 花童最初是嬉皮士的同义词,意指一群理想主义的青年人聚集在旧金山,他们身戴花朵或是分发花朵以表达大爱无疆、和平友善。大众媒体将之用于指代嬉皮士。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 Arnold, Matthew. *Culture and Anarchy*. Trans. Han Minzho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
- Barker, Chri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Luo Shihong et al. Taipei: Wu-Nan Book Inc, 2004.
[克里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罗世宏等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 Byatt, A. S. *The Virgin in the Garden*. London: Vintage, 2003.
- . *A Whistling Woman*. London: Vintage, 2003.
- Carter, Ronald, and John McRae.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London: Routledge, 2001.
- Davis, Steve. "Birds of Paradise." *The Independent Magazine* 7 Sept. 2002: 24.
- Dong, Hongchuan. "Walk Out of the Modern Predicament: 'Only Connection': On the Implication of Hominology in Forster's Novels." *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2 (2001): 61-67.
- [董洪川:《走出现代人困境:“只有沟通”——试论福斯特小说创作中的人学蕴涵》,《重庆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61-67页。]
- Fisk, Joh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Trans. Wang Xiaojue and Song Weijie.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1.
-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 Garnham, Nicholas. "The Media and Narratives of the Intellectual."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7 July 1996: 359-84.
- Horgan, John. "Science Set Free from Truth." 16 July 1996. 10 Apr. 2010. <<http://www.nytimes.com/1996/07/16/opinion/science-set-free-from-truth.html>>.
- Kuhn, Thoma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 of Chicago P, 1996.
- Levine, George. "One Culture: Science and Literature." *One Culture: Essays in Science and Literature*. Ed. George Levine and Alan Rauch.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87. 3-34.
- Liotard, Jean-Franço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4.
- Massie, Allan. "Satirical Swing through the Sixties with a Modern George Eliot." *The Scotsman* 7 Sept. 2002: 6.
- McGurk, E. Barry. "Gentlefolk in Philistia: The Influence of Matthew Arnold on E. M. Forster's *Howards End*." *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1880-1920* 15. 3 (1972): 213-19.
- Norris, Pamela. "Foxy Sexuality." *Literary Review* Sept. 2002: 51-52.
- Sheng, Ning. "Out of the Dilemma of Culture Studies."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7 (2011): 5-13.
- [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文艺研究》2011年第7期,第5-13页。]
- Snow, C. P. *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64.
- 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3.
- .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Xu, Ruiqing. *Forms of Television Culture: On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7.
- [徐瑞青:《电视文化形态论——兼议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 Zhang, Qi. "On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14): 138-44.
- [张琦:《小议“文化”》,《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4期,第138-44页。]

(责任编辑:白雪花)